

## [主訪者導言/再版序]

# 口述史與檔案的對話永無止境

陳儀深  
國史館館長

這一本《濁水溪畔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錄》是本人接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委託，於 2008 年下半年執行、2009 年 3 月出版的。其後由於更多二二八檔案出土，筆者有感於口述史料與檔案文件可能相互佐證、也可能相互矛盾，就在 2013 年的一場研討會上發表〈雲嘉二二八再探——口述史與檔案的對照研究〉，這篇論文後來收入拙著《拼圖二二八》一書（2019 年 7 月、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的附錄。正如我在《濁水溪畔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錄》導言所提到的，本書關於雲林二二八的田野訪談，準備工作除了閱讀二二八基金會的補償資料，也必須同時和已出土的檔案做初步比對，才知道（例如）顧尚泰醫師等三人的罪名既是圍攻林內駐軍防地索繳槍械，為什麼是在虎尾執行槍決？因為在林內被繳械的軍人，就是虎尾機場被攻破以後、沿著濁水溪逃出來的那一批軍人，當整編第廿一師救援部隊來了以後，那一批軍人才回到虎尾駐地。

像這樣，口述史料和檔案的比對研究幾乎可以是無止境的，我在 2013 年撰寫〈雲嘉二二八再探〉的時候發現，關於 3 月 18 日古坑、梅山交界的國軍伏擊事件，前輩張炎憲的訪問紀錄與鍾逸人回憶錄的說法一樣，都以為張榮宗就是在此時此地犧牲，但此說卻被新出土的史料推翻了（參見〈呈報事變暴徒張榮宗潛返活動案〉，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藏二二八史料，檔號：A\_03\_0024-001~005。），因為 9 月中旬情治人員還看到張榮宗進出斗六、斗南的旅館，說他「深夜盜竊該社棉被兩條，不付宿費而去。經常化裝布商投宿旅社，意在竊取棉被，以備冬季在山生活，一面連絡流氓刺探當局情況。聞前西螺警所被劫時，張亦參雜其間，使用日語指揮匪夥。」；新出土的史料還揭露一件事，即當時重要的情治頭子林頂立（張秉承）是雲林人，曾經勸同鄉參議員陳海永向斗六區署自新，果然陳海永、陳海湖兄弟還（進一步）進入山區，勸導斗六青年十一名於 4 月 13 日出來自新——25 歲的游賜壹赫然在名單裡面！可是筆者於 2008 年 8 月訪問

游賜壹先生（本書頁 73-92）的時候，他對此事隻字未提。這個意思就是，如果筆者早幾年看到保密局的檔案，就可以在訪問游先生的時候，追問他自新的經過以及陳海永的角色。可惜游先生在受訪之後不久就去世了。

政府在 1995 年 4 月 7 日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同年 12 月行政院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受理二二八補償申請、核發補償金，並透過舉辦各種紀念活動、回復受難者名譽、真相調查與實地訪察等事宜，以撫慰受難者及家屬之心靈創痛，促進台灣社會查明與瞭解真相，以實現轉型正義。筆者除了有幸幾度擔任基金會董事，更以曾經受委託訪錄我的故鄉雲林的二二八口述史為榮、為幸，茲因本書《濁水溪畔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錄》早已售罄，感謝基金會願意再版，我除了校訂一些錯字，並綴補以上文字作為再版序。



## [主訪者導言/代序]

# 以口述歷史探查雲林二二八

陳儀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十幾年來，我的研究領域重心從近代中國思想史轉移到台灣政治史，就是從二二八事件的專題研究開始，包括事件的原因、處理委員會的角色、南京政府的處置、蔣介石的責任問題等等，根據檔案和口述史料，已經可以把握主要的梗概。但是高層的決策、精英的互動是一回事，一般鄉下民眾的經歷、見聞可能是另一回事。

感謝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委託，讓我（在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1 月之間）有機會針對我的故鄉雲林縣，做一次堪稱深入的二二八田野調查。記得 1980 年家父病重即將辭世那一年，我問他林內鄉在二二八的時候發生什麼事，他說隔壁村的「成仔」出來敲鑼打鼓，叫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出來抵抗），以致一些鄉民「竹篙湊菜刀」去濁水溪畔相戰；平時家父不談論政治，我趁機刺探一下他的傾向：「您感覺（他們的行動）如何？」他不假思索回答：「真勇敢！」不過 2009 年初我回到林內鄉訪問坪頂耆老楊重先生，他屢次說台灣人「第一等憨」（沒武器、沒訓練還敢抵抗）；他說民軍準備圍攻神社頂的國軍時起了大霧，是「天不肯」……要如何判讀這樣的鄉野語言呢？如果以今日藍綠分野的角度，很可能得到相反的結論。

## 從林內出發

濁水溪畔的命案現場，主要是（昔日稱作溪仔底的）林內鄉三號水門—觸口一帶。據受難者周坤山的兒子周枝友說，國軍經過時曾對田野間工作的農民濫射，進入民宅索取食物，死亡的民眾包括竹山來的民軍共有 23 位；由於他是協助搬運屍體到林內（台西）客運車站的見證者，所以能夠描述說「幾十具屍體排在那裡，好像在曬甘蔗一樣。」這批國軍繼續往上走，到達坪頂村時除了一位受到菜刀割傷面頰或耳朵以外，並無遭遇抵抗。據坪頂村長林賢宗說，該村目前人口約 800 人（220 戶），戰後初期人口「比現在還多」，當時的鄉長張旺，大概擔心這樣人口密集的山頂聚落的安全，所以就把這批軍

人引導到林中村的神社（幾公里外的一個山頂）。據坪頂村耆老的描述，曾有一位二水來的人裝了一袋手榴彈準備和國軍「輸贏」（但未成真），這批軍人有人會講台語，研判是來自福建的「外省人」；儘管有隔壁村的鷹派「成仔」鼓吹抵抗，但坪頂人自知條件不足並不踴躍，只是儘量躲避，還有人煮食供應國軍。

關於國軍在林內的動向，存在著異說。一般認為張旺鄉長把他們引導到林內神社上面，也就是現今的淵明國中地點，但是當時任職於林內鄉公所的林義成先生，回憶說鄉長是把他們引導到舊鄉公所（寶隆紙廠內）旁邊的倉庫，才把他們安頓下來，至於神社上面的是民軍不是國軍。最後訪問到事發當時在顯宗醫院工作的陳天成先生，明確指出鄉長張旺與卓和尚醫師等人去坪頂向國軍勸導繳械之後，將槍械鎖在舊鄉公所旁邊的倉庫，人員則在林內國校或神社等地；至於「包圍」林內的國軍，應是另一批隨後前來救援的部隊。共同的回憶是，兩軍對陣的那天突然起了濃霧，以致沒有槍戰，免了一場劫難。之所以會有異說，個人研判可能的原因是，虎尾機場出來的一批國軍先到，支援的整編 21 師後到，他們停留的地方不同，鄉民不可能弄得清楚。

## 竹山與林內的聯結

林內與竹山隔著清水／濁水溪，分屬不同縣，但是一方面距離只有 9 公里，一方面林內火車站從日治時代開始就是重要的轉運點，受訪者林榮寬說，林內的出貨量在台南州（大台南縣）是數一數二的，林內與竹山之間有輕便車（台車）相聯，基於這些原因，竹山人的旅運進出經由林內是很自然的事。無怪乎，隨著二七部隊進入埔里的謝雪紅，逃離的路線是先到竹山，然後經由林內搭火車離開。<sup>1</sup>

竹山人率先為二二八犧牲的是張昭田，他在 3 月 6 日參加攻打虎尾機場的行動中死亡；其次是 3 月 7 日前往林內濁水發電廠附近攔截國軍的一群竹山青年，根據受難者廖如賓的兒子廖國揚的追查，「竹山（人）被打死的都集中在一個區域，就是發電廠再上去的那個大圳溝」；「那九具屍體是先被搬到林內車站，再從竹山派車去載回來」；「屍體集中放在竹山公會堂，家屬再各自領回去，其中有些家屬比較貧困或者是不敢處理的，就採取公葬的方式，由竹山鎮民募款幫忙安葬」。

由虎尾機場逃出的國軍雖然滯留在林內，但林內人接受號召前往圍攻的似乎寥寥，不若竹山人主動踴躍。或許如張宗憲所說：竹山是一個有反抗傳統的地方。

---

<sup>1</sup> 謝雪紅在 1947 年 3 月 16 日-31 日滯留竹山，然後經由林內搭火車回彰化。詳見楊克煌遺稿、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台北：楊翠華出版，2005 年），頁 344-347。

## 斗六醫生陳篡地傳奇

陳篡地（1906-1986）是彰化二水人，日本大阪高等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回台後先在斗南開業，除了眼科之外也兼看內科；與謝玉露（1910-，嘉義人，東京女子醫專畢業）結婚以後搬到斗六，以「陳眼科」診所為民眾看診。

陳篡地在日治時期曾被徵召去越南當軍醫，戰後又有一段時間淪為越共的俘虜，所以對槍械、游擊戰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他的兒子彥文說他從越南帶回來一批槍械，在二二八的時候派上用場，此說猶待查考；但彥文澄清說父親與共產黨無關，應屬可信。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陳篡地出面組織民軍，一方面維持治安，一方面（如妻子和兒子所說）率隊攻打虎尾機場。當國軍支援部隊逼近斗六時，陳篡地為避免市街戰乃率隊退往古坑樟湖山區，此舉應有繼續抵抗的意思，因而吸引北港、台中等地的民軍前來會合。不過綜合樟湖在地人廖連池以及曾與陳篡地並肩作戰的游賜壹等人的回憶，樟湖並沒有發生兩軍對打的激烈場面，而是發現有線民帶領國軍繞小路來包抄，就命大家解散逃生，先前發生戰鬥的地方是從竹山上去的桶頭，<sup>2</sup> 游賜壹說他們「永光子弟」使用機關槍由上往下與對方對打，並說這是二二八的最後一戰。謝雪紅離開埔里抵達竹山的時候，曾經考慮要不要轉往小梅（梅山、樟湖）與陳篡地會合，後來由於「對陳篡地的政治面目我們不瞭解，所以不敢冒然進山」。<sup>3</sup>

在官方的檔案之中，所謂「樟湖之戰」有著重要的位置，它的時間在4月6日前後，主角是陳篡地 vs. 整編第21師145旅434團第二、三營及435團第一營：

因據報小梅（台南縣屬嘉義區東北部）以東之十字關、外湖、草嶺、清水溪一帶山地之內，尚有成股匪徒約三、四百名，匪首陳篡（篡）地時出沒於小梅、竹崎附近，搶劫居民，團乃決心予以圍剿，當以二、三兩營及四三五團第一營及各一部之兵力，分路包圍清剿。五日晚各就攻擊準備位置，六日拂曉開始進剿，團長率團部官佐一部，推進小梅指揮。匪徒前於十字關、樟湖被我痛擊後已潰不成軍，聞大軍圍剿則倉皇逃遁作鳥獸散，武器則埋藏於深山中；一部匪徒攜有短槍逃匿於鐵道沿線，經三日之搜剿計擊匪徒一名、捕獲匪徒十餘名，搜得械彈器材甚多。

4

<sup>2</sup> 桶頭在行政區屬竹山鎮，位於竹山往草嶺的半路上，距離竹山14公里；地處清水溪上游，日治時代即有一桶頭吊橋，直行先到樟湖後到草嶺，右行是往嘉義梅山。<http://home.educities.edu.tw/doggyinn/chhsn/tongtoubg.htm>，瀏覽時間2009年2月2日。

<sup>3</sup> 古瑞雲（周明），《台中的風雷—跟謝雪紅在一起的日子裡》（台北：人間出版社，1990年9月），頁117。

<sup>4</sup> 「陸軍整編二十一師一四五旅四三四團綏靖工作概況」，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頁126-127。

在此之前，也就是 3 月 19 日 434 團抵達彰化以後，將所部分駐於彰化市、員林、二水、埔里、日月潭各地區擔任搜剿及維護交通之任務，這時即發生「樟湖之戰」：

尤以樟湖一戰擊潰中部僅有的股匪主力，由是各地奸暴殘餘紛紛星散而歸消逝。是役擊傷斃匪徒四五十人，俘五名，鹵（虜）獲機步槍四十餘枝，而團僅傷亡士兵三名。……故「樟湖之戰」是為台灣中部安定之一轉鈕點，其後廣大地區得遂步其善後綏靖工作者胥賴於此。<sup>5</sup>

陳篡地離開山區之後，經由林內潛返老家二水，竟然在親戚的協助下，在山洞裡躲避 6 年，其中經常送飯的是他哥哥的女兒陳碧草。當局為尋找陳篡地的下落，曾多次逮捕他的兄弟陳秦、陳秀、陳察、侄女陳碧草等予以逼問不果，據陳篡地的兒子陳彥文說：

這些親戚們後來的境遇都很慘，六年內有四個親戚朋友因此被政府槍斃，包括我堂哥陳崑崙（混淪）和姑丈（許聆音）。我堂哥那時候才 18 歲，已經結婚，還有一個小孩，我姑姑也從此守寡，他們的人生都變得很黑暗。（詳見本書「2.陳彥文先生訪問紀錄」）

根據許聆音的兒子許義章所述，許聆音曾數次送食物到二水鄉坑口村的山裡給陳篡地，因有人密告，遂於 1950 年 3 月 7 日在西螺家中被捕，「寧死也不說出五舅藏身地」，1950 年 6 月 26 日判決書將許聆音、陳順辰（陳篡地的堂弟）、陳混淪（陳篡地的侄兒，判決書誤寫為陳崑崙）、謝明通（台中）、張炎祈（西螺）等五人判處死刑，同年 7 月 19 日執行槍決。<sup>6</sup>

荒謬的是，上述的判決書誣指陳篡地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首領」，在 1952 年被捕之後竟能舉家遷到台北繼續行醫——雖然常年被保安人員（以到府上班的方式）監視；而許聆音等五人卻要被處以極刑，顯示政治案件的量刑並無客觀標準。若說戒嚴統治的當局會遵守「談判」的諾言，實不可思議，比較大的可能性是，陳篡地的二水同鄉、中學同學謝東閔的保釋發揮作用。

<sup>5</sup> 「陸軍整編二十一師一四五旅四三四團綏靖工作概況」，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年），頁 124。

<sup>6</sup> 許義章（19971229）。〈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陳崑崙等人案——民間資料——許聆音事件調查表〉。《數位典藏聯合目錄》<http://catalog.ndap.org.tw/?URN=1428812>（2009/01/31 瀏覽）

## 虎尾機場事件

「虎尾巴文化協會」的楊彥騏先生介紹說，日治時代的虎尾郡簡直就是軍公教特區，當時的郡役所、糖廠、虎尾高等女學校、虎尾農業學校、虎尾家政學校都設在這裡，甚至有一座空軍基地；二戰之後，光是虎尾郡被遣送回去的日本人就有七千人，這附近除了嘉義市以外，就是虎尾被遣送的日人最多。二二八事件之際由於虎尾空軍基地的守軍人數不多，當大林、斗六、北港、西螺的民軍前來包圍，予以斷糧斷電，撐不了幾天就逃走了，前文所述林內埤頂的國軍就是從這裡去的。不過沒幾天國軍支援部隊抵達虎尾以後，攻佔機場的民軍就一哄而散。這種「攻佔」的意義原本不大，只是就整個二二八事件而言，民軍曾經「戰勝」的似乎僅此一樁。

虎尾街民宅歷經國軍搜索，被捕捉的人則先被遊街示眾，然後被押到馬場（現在的東市場）公開槍決。當時敢去收屍的人算是較有勇氣，虎尾郊外的「埤內」有一間三姓公廟，就是安葬王濟寧、李持芳以及顧尚泰醫師三個人。<sup>7</sup>

很多人說虎尾機場之所以被民軍攻陷，是因為民軍採取「水攻」，引嘉南大圳支幹的水來淹沒機場，或是出動消防車對防空壕灌水，<sup>8</sup>這也許是欠缺武器的民軍所能想到的辦法。由於當時圳溝的地勢高，而且是土堤（未如今日般抹上水泥），要弄個缺口讓水漫出並不難。不過在地的蘇金順老師不以為然，他認為「水攻的說法，應該是指把他們的自來水源切掉，電攻就是把電源切掉。灌水是不可能的，用水淹機場，以常識來想也是不可能的。」

## 北港二二八

日治時代的北港郡已經是熱鬧的地方，人口密集意味著南洋回來的台籍日本兵也比較多，加上地理位置關係，二二八時會有「北港隊」去參與嘉義水上機場或虎尾機場的戰鬥，是自然的事。根據昔日許雪姬教授的訪問，北港青年阿啟仔、阿木仔他們的「自治聯軍」是對外戰鬥的組織，「北港保安隊」則是負責市內治安；當時在嘉義地方法院擔任柔道教練的北港人許王辰，就是北港保安隊的領導。<sup>9</sup>

國軍抵達北港之際，自治聯軍原擬擺開陣式抵抗，但在許王辰的力勸之下同意撤往

<sup>7</sup> 檔案中顯示，顧尚泰等三人被槍決的理由是「參加此次暴動圍攻林內駐軍防地索繳槍械」，且註明「由羅（迪光）營執行在虎尾槍決」。見「嘉義市軍警憲緝獲三二事變暴動人犯執行槍決一覽表」，收入《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四）》（同前），頁 121-122。

<sup>8</sup> 「溫連章」訪問紀錄，張炎憲等，《嘉雲平野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年2月），頁 98。

<sup>9</sup> 據稱，武器是由北港分局主動提供，許雪姬主訪，〈高總成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3期·二二八事件專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2月），頁 81-82。

梅山，許王辰也參加了撤離的隊伍，大約四輛卡車到達古坑、梅山交界的崁腳時，遭到國軍伏擊，死傷慘重。據許王辰的太太林玉英說，「當地農夫已將 29 具遺體掩埋在一處，而伯父等五人先將我先生的遺體挖出來，另掘一坑……並且把他的頭髮指甲剪一些回來當作紀念。」除了現場被打死的以外，被捉回北港的則先遊街示眾，然後在北港溪畔槍決。

死難者蔡柳枝的侄子蔡連財先生說：「一般北港人去參加二二八而死亡的，大都死在大埔美的比較多。」所謂大埔美就是上述古坑、梅山交界的地方，地形險要，一旦國軍的機關槍架設在轉彎的高處，凡通過的民軍極難倖免一死。

此次訪問到許王辰的妹妹高許來貴女士，以及她的女兒高淑慧女士，從而對許王辰以及他的妹婿高總成先生有進一步的瞭解。許王辰和高總成所參加的保安隊，在維持治安的時候不但保護外省人、呼籲台灣人不可趁火打劫，並且禁止生意人藉機抬高物價，自認不是從事反政府的行為，為什麼事後大家還要去辦理「自新」？更讓高總成感到不滿的是，他們到虎尾中山堂辦理自新的時候，排成一排排，機關槍馬上圍上來，指著每個人，在這種氣氛之下唸著誓詞。<sup>10</sup> 1993 年高總成去世以後，家人才找到這張「盲從附和被迫參加暴動份子自新證」，內容說「現已悔悞(悟)改過失(矢)志永作良民……」，我們一面拍照一面捧讀，可以感受到他們昔日的屈辱之感。

## 見證二二八的古坑現場

前述著名的「樟湖之戰」，地點就在今日古坑鄉的樟湖村或往竹山方向的桶頭一帶。剛從中國來台灣的整編 21 師，進入山區恐不易分辨詳細的地名，若以樟湖為中心，往北是竹山的桶頭，往南經古坑的十字關，往西是嘉義縣梅山鄉，往東則是更深山的草嶺，這樣橫跨南投、雲林、嘉義三個縣的地區所發生的戰事，籠統稱為「樟湖之戰」也就不足為奇。

樟湖村村長廖連池說，二二八的時候來到此地的民軍近百名，是由陳篡地帶領，他們接收派出所的武器以及一輛客運巴士，並且以學校當軍營。但是當他們知道國軍兵分兩路包抄進來，也就是聽到槍聲隆隆的時候就開始逃走了，所以據他所知在這裡並沒有發生對峙衝突的場面。他們對國軍的印象是殘忍而恐怖的，因而就像林內坪頂上面的居民一樣，在國軍抵達之前大家都跑進山裡去躲避，樟湖一時成為空城。

死亡人數眾多的，應該是山腳下古坑、梅山交界，也就是來自北港、朴子等地的民

---

<sup>10</sup> 同上註，頁 83、85、86。

軍準備上山時，被國軍伏擊的現場。由於受難者張榮宗<sup>11</sup>的女兒張秋梧，1997年11月18日到崁腳村主持挖掘遺骸，加上當地村民的口頭證言，張女士鏗而不捨在古坑鄉公所、雲林縣政府以及行政院之間奔走，遂得以在古坑鄉綠色隧道旁邊建造紀念碑與紀念公園；為了安置挖出的骨骸，也在古坑鄉公墓旁蓋了一個藝術造型的建物。

## 結語——以口述訪談做為歷史研究的一次演練

所有的歷史最初都是口頭的，不論古希臘的學者或公元三世紀中國的司馬遷，都會從平民中搜集口頭證言。不過這種古老的技藝之所以在二十世紀復興，是從1940年代磁帶錄音機上市開始的；其次，隨著民主化的潮流以及人權觀念的普及，所謂移民史、黑人史乃至猶太人遭納粹屠殺的歷史，莫不顯示文字檔案的侷限性，換句話說，口頭紀錄若不是比文字文獻更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sup>12</sup>

回顧台灣的經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所長郭廷以鼓吹並實踐口述歷史訪談不遺餘力，但戒嚴時代訪談的對象集中在退休將領與外省政治人物，與斯土斯民少有關連，解嚴後民間力量勃發，台灣史前輩學者許雪姬、張炎憲等從事二二八口述史料的採集，成績相當豐碩。九〇年代李登輝主政時期部分實現的轉型正義（包括建碑、道歉、補償），實在與口述歷史的成果關係密切。

不過，儘管透過檔案研究已經可以肯定蔣介石應為二二八事件負最大責任，<sup>13</sup>但是2007年為了中正紀念堂改為台灣民主紀念館，藍綠陣營上演了慘烈的攻防，2008年中國國民黨奪回政權以後，又以粗暴的方式恢復舊觀。這種現象固然可以理解為政治人物的操弄、選票考量掩蓋了歷史的真相與正義，但是二二八事件距今不過六十一、二年，台灣庶民對此一歷史的認知已經模糊了嗎？如果政治不過是記憶與遺忘的戰爭，我們還能夠做什麼呢？

總之，這一次雲林二二八的田野訪談，讓我可以和相關檔案作初步的比對，例如瞭解到顧尚泰醫師等三人的罪名既然是圍攻「林內」駐軍防地索繳槍械，為何執行槍決的地點在「虎尾」；也可以在異說裡面找出比較可靠的一種，例如林內坪頂的國軍是否被繳械而又如何被保障安全，以及起濃霧那天到底是誰在包圍誰？經過這幾個月訪查，

---

<sup>11</sup> 張榮宗（1908-1947），嘉義朴子人，時任朴子鎮副鎮長。據鍾逸人先生的回憶，張榮宗是在3月12日率領車輛和人員從新營出發，經北港等地來到古坑大埔美這裡遇到埋伏。參見鍾逸人，《辛酸六十年》（台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年），頁386-388、573-574。

<sup>12</sup> 這方面的討論詳見 Paul Thompson 著，覃方明等合譯，《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62-65、91-93。

<sup>13</sup> 參見張炎憲等，《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台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年），陳儀深撰寫之第三章。

個人雖然比一般人更瞭解雲林二二八的真相，但同時也感受到追查歷史真相的困難，不得不興起謙卑之心、戒懼之情。

一部好的口述歷史作品，很大程度取決於聽錄音帶整稿的人（是否忠於原味是否文筆流暢），我很幸運得到三位優秀助理的協助，才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二十幾個人的訪問紀錄。本書採用中研院近史所的傳統方式，即以第一人稱依時間或邏輯順序敘述，容許些微的調整調動以方便閱讀，但碰到特殊情況即保留問答方式來記錄（例如林內鄉坪頂村村長辦公處的訪談），這兩種方式其實各有利弊，應可依需要而定。此外，須要向讀者致歉的是語言方面我來不及統整一致：周維朋先生習慣保留若干福佬語的措辭然後以普通話做註，而簡佳慧、陳雨君則直接以一般人熟悉的普通話來整稿。好在整體而言並不突兀，保留不同的方式正好顯示口述史作業的多樣性，也許可以做為歷史系學生的參考範例。

